

不断夯实『何以中国』的学理支撑

孙庆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考古研究者积极响应号召,聚焦文明阐释研究,大力推动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为民族溯源流、为文明寻根脉,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新中国考古学的两位巨擘——夏鼐和苏秉琦,将毕生所学所思分别凝练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两部宏著,清晰昭示了中国考古学以文明为观照、以阐释为旨归。新时代以来,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商文明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考古工作者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实证“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同时强化了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新发现的距今约60万年前的“郧县人3号头骨”,为百万年人类演化史提供了关键证据。通过对古人骨材料系统的古DNA(脱氧核糖核酸)和古蛋白研究,证实我国学者提出的我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是科学合理的,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确立了中国话语。对浙江上山文化水稻遗存和北京东胡林遗址炭化粟的研究,表明“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已经形成,揭示出一万年文化史的经济基础;规模宏大的浙江良渚古城,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通过对良渚等遗址的深入研究,中国学者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成为中国考古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近年来,考古学者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进行阐释研究,不断夯实“何以中国”的学理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快实施,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考古学视角深刻解答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科技考古快速发展,考古信息提取和文物成分分析手段不断丰富,深化了对中华先民技术创新的理解;史前聚落、历代都邑和礼制考古持续加强,展示出中华文明持续的制度创新。围绕“何以中国”“多元一体”等议题,史前文化谱系和中原中心形成过程更加清晰,边疆考古为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提供考古学证据,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对陶寺、二里头、殷墟等都邑遗址的发掘不断取得新成果,展现了历代都邑多种文化因素和谐共生的包容样态。针对“天命”“德政”“中国”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关键概念,利用考古材料诠释中华文明“中”“崇”“德”“尚”“礼”的精神内核,让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质更具体、更富历史内涵。

在“为人民做学问”的感召下,越来越多考古学者主动走出书斋,走进大众,通过考古纪录片、科普读物、文化活动和学术讲座等各种形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易接受的文化资源,以史育人、以文润心。同时,考古学者积极寻找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演进等关键学术领域,把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中华文明精髓转化为国际社会能理解、能接受、能共鸣的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文明成就和中华文化精神的有效传播。

新时代以来,考古学者积极搭建和参与世界考古论坛、良渚论坛等文明对话平台,与国际同行同台论道,相互切磋,有效提升了中国学者在文明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深了其他国家学者对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认知和接纳。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时代境外联合考古蓬勃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联合考古队深入洪都拉斯的热带丛林,在科潘遗址探寻玛雅文明的奥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传奇古都孟菲斯古城发现了神庙建筑遗址,为埃及考古贡献了中国力量;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深耕中亚考古,取得了考古发掘和遗产保护的丰硕成果,是考古学促进民心相通的成功典范。据统计,仅在“十四五”时期,中国考古学者在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这些来自田野考古一线的最新成果,为展示多元文明风采、增进文明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带来新机遇。考古研究者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积极为党和人民建言献策,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贡献考古学力量。

(作者为西北大学校长)

韶山脚下曹端祠

刘娜娜

“公生明,廉生威”这句话大家都不陌生,它出自36字《官箴》,是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所作。据考证,《官箴》最早出自明代代理学家、教育家曹端之口。明永乐年间,曹端的弟子郭晟被授西安府同知。上任伊始,郭晟请教恩师曹端为政之道。曹端曰:“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欺,公则民不敢慢。”

我的家乡河南滎池正是曹端祠的所在地。滎池县曹端祠,静静地依偎在韶山脚下,这里有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小院,便是曹端祠。2016年,曹端墓公布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它是我们一群孩子的童年记忆。我们穿过吱呀作响的木门,在长着青苔的院子里追逐。印象最深的是院子角落里的古井,我们趴在冰凉的青石井栏上争着朝下喊,听自己声音的回响。井水很清,能看见底下墨绿色的苔痕。那时的我只觉得它是可口寻常的古井,还不懂得“公廉”的深意。曹端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宛若

井底那块模糊的石头——知道其存在,却从未看清深刻的纹理。

多年以后,当我穿上检察制服,再次站在曹端祠前,一切都一样了。那井水成了一面镜子,为我照进了一位明代先贤“心清如水,政明如镜”的格言,时刻警醒我做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职业生涯中,儿时觉得遥远的古训慢慢和我产生了联结。当我面对复杂案卷,需要拨开迷雾探寻真相时,“公生明”三个字成为我恪守的工作方法;唯有出以公心,摒棄成见,才能让事实的本来面目如井水映月般清晰呈现。在办理一起错综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时,我曾连续数周埋首于证据的迷宫。每当疲惫不堪之际,我总会想起那口井——它之所以清澈见底,是因为自身足够深、足够净。

更为深刻的转变,是我对“廉”的理解。小时候,我以为“清廉”就是不贪不占,是一种静态的品德。直到我为了帮一位被騙走养老钱的老人追回钱款,辗转千里,最终将钱款交还到他颤抖的手中,看着那位老人老泪

考古中国

西周时代是金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郭沫若曾说毛公鼎这样的长篇金文可抵一篇《尚书》。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西周金文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孔子盛赞西周文明,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的独特道路,必须系统考察、研究、阐释殷商和西周的金文史料。

西周金文可概括为“金文两系说”,即殷系与周系。

西周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内容、格式继承殷金文者数量甚多,可称为“殷系”。需要说明的是,西周前期即共王之前,天子、诸侯、重臣也多接受殷式酒器与殷系金文,反映了西周对大邑商文化制度的继承。

西周王朝建立后,就积极推行其姓氏婚姻、宗法排行、幼名与冠字等文化礼俗,以及训诂、册命等制度,周初金文中迅速出现上述周人文化因素。以女子称姓而言,周人克商之前就通过异姓联姻团结友邦、扩充实力,《诗经》之《思齐》吟唱“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周姜是公亶父的夫



图①:西周时期的丰卣及铭文。刘源供图

图②:郑州商城遗址书院街出土的部分青铜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③:石峁遗址皇城台西侧墓地出土的陶器组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关乎党的理论创新,关乎文化主体性,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本版邀请3位考古文博工作者,谈谈他们的感悟与思考、实践与收获。

——编者

金文所见西周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刘源

人,大妊是季历的夫人,大妣是文王的夫人,均是姬姓周人与姜、妊、妣等姓通婚结盟的写照。西周早期金文记载王妊作器,多次提及王妣、王姜赏赐与下达命令之事,其中王妊、王妣、王姜就是出自妊、妣、姜等姓的王后,与《思齐》完全能够相互印证。

周人男子称氏,如周公、召公、毕公的周、召、毕均是彰显其家族的氏名,与殷商使用族徽形成鲜明对比。西周前期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中姬姓和异姓家族氏名、各地诸侯氏名都大量出现。这是见诸西周金文的显著特点,殷商金文则迄今未见诸侯作器铸铭的明确例证。

周历月相是指每月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时段,和字的尊称一样,最晚在穆王时代也较广泛地出现在金文中了。这既反映当时周历正朔统一推行至王朝疆域各地,也说明掌握文字的殷人史官集团学习周人名字、月相等文化再运用到文书撰写之中,有一个逐渐适应和创新的过程。

西周建立以后,其姓氏、排行等文化因素与殷系金文相结合,

同时剔除掉已废止的周祭、寝官、戌官等制,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武王克商以后,青铜礼器铭文出现了字数拉长、内容丰富的特点,形成“周系”金文。与简单记述君王蔑历赐贝、为祖先作尊彝的殷系金文不同,周人重臣、大族制作铜器铸铭文时,非常重视周王和君主的诰命与赐民赐土的细节,会转录到礼器铭文中,这就使周系金文字数一下增多了。成王时的何尊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王诰宗小子”的话,就占据7行多70余字,王诰内容是历数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后天“宅兹中国”治理人民,同宗贵族的先父辅助文武,有功干天,众贵族也要助王顺从天意,实施德治。如果去掉这段诰命,何尊铭文就成了简单的“王赐何贝,作宝尊彝”的简单殷系金文了。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有290余字,其中260余字都是康王的诰命,足抵一篇《尚书》。《尚书》周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实际上也与这些周系金文互为表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系金文到了周共王时代逐渐发展为

认识久远的夏商文明

常怀颖

认识久远而神秘的夏商文明,考古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建立在夏商考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为考古学“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了力量。

10年间,夏商周考古研究有两个突出的趋势。其一,是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商文明研究”等国家组织和主导的大型科研项目带动主动性田野工作,明确了工作重心;其二,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模式逐步在夏商遗址中得以实践。经过艰苦漫长的田野工作和精细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看到,中原以外考古学文化序列得到完善;都城、城址的聚落考古理念付诸实践;以王朝诞生和早期发展探索为核心,贵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群流动与交融、技术传播等重大问题研究得以开展,回答了中国早期国家化如何展开的学术之问。

在晋陕高原,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兴县碧村等石城遗址的系列发掘,揭示出河套至北方长城地带龙山晚期社会人口规模、资源开发程度和社会财富积累量显然远远超越了当地此前数千年。聚落数量激增,都邑性聚落出现,社会结构多级化不断增加,出土了代表文明发展程度的高等级遗迹、遗物,社会形态越来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出现早期国家,昭示着一条不同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夏商时期,南流黄河两岸以石峁皇城台、辛庄、寨沟遗址群、离石后石村、昔阳钟村墓葬等为代表的遗址的发掘,廓清了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和社会发展面貌,令人惊讶不已。赤峰三座店石城、喀左二布尺南、北京新官、涑水富位遗址相继发掘,对于了解在燕山南北地区的年代序列、聚落形态、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材料。辛庄、寨沟、富位遗址及相关墓地的发现,为研究

早期王朝国家的发展与地方经略模式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材料。

在巴蜀,宝墩聚落考古工作发现两重城垣和墓地、高山城址发现宝墩文化年代最早的墓地,填补了夏代当地文化遗存的空白。三星堆遗址城址及新增“器物坑”的精细化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上万件遗物,揭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青铜文明。

夏商聚落考古的根本难点在于其空前巨大的规模。近10年中,各地考古工作者自觉、主动以聚落、城墙或壕沟、道路等遗存为关注中心,探索线性遗存围合形成的聚落空间规划单元。二里头新发现多个布局严整的网格街区,与洛河以北古城村的壕沟与墙体相结合,说明早期王朝城邑必有复杂的城垣(壕)围护。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方城八里桥等10余处夏商城址相继发现大型建筑,也都存在不同结构的环境、城墙以及道路、壕沟或墙体分隔的网格状街区布局,彰显了夏商时期都邑已经具备明确的空间利用和设计规划。殷墟的持续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洹河南北“干道一街一巷”的不同层级结构道路网络,显示出大邑商的城市布局与功能区划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周口时庄、淮阳朱

丘寺、蔡阳东赵发现了年代最早的围垣粮仓,说明了国家阶段对物资的吸纳和统筹、集散能力,是非常大的突破。

二里头、殷墟、盘龙城的多学科分析实践,代表夏商考古已经进入多学科综合分析进而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阶段。利用环境考古手段对都邑的水利系统和选址进行分析;利用冶金考古方法进行金属器的矿料来源获取、金属资源生产和技术传统传承;动物考古进行肉食资源、动物皮毛资源和祭祀用牲分析,也讨论资源流动与繁衍饲养;植物考古探讨夏商时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考古学家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分析夏商家族形态等问题……在已经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阶段,各地理单元会有不同人群世居其间,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总会发生,探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业经济成为自身。

回到材料本身,重视文物、迹象本身,对不同遗址间近似现象的宏观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依然是夏商考古最基础和最有价值的工作。期待下一个10年,夏商考古能产生更多的成果,更生动展现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听见『荒草里的声音』

潘晨嫣

2023年我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在此之前,文物之于我,就是摆在博物馆展柜里的展品,或是矗立在城市中心、用来展示城市文化底蕴的标志性物,展示日常生活很远。直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我跟着几位文物工作者满城寻找文物,才对文物工作有了切实的感知。

有一天,他们突然停在了路边一个荒草堆前。我有些疑惑:这里能找着什么?这个地方我年少时就来过好几次,还在这里玩乐躲藏,难道文物一直就在我眼前?

普查队员绕着土堆观察了一阵,然后带着我去了附近的老陈家。老陈听说我们是来打听此处土堆的事,像是终于找到了知音,热心地和我们分享起他的收藏。他从后院拿出一块砖,上面清晰地刻着“长沙府醴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恭,修作匠王萃,人户邓均”“洪武七年”等字样。从老陈那里才知,这土堆是一座600多年前的砖窑,专门为明南京城墙烧制城砖。我看着露在外面的窑室,像一只黑黢黢的眼睛,它已经沉默地望着天空600余年了。至此,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才被揭开。

翻阅文献可知,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年至十九年(1369—1386年)役使

20万工匠和农民,修筑周长约30公里的南京城墙。所用城砖由长江中下游五省125个县的民户负担,烧制成统一规格。醴陵左权镇新阳村窑下湾窑址,就是其中之一。古代工匠管理严格,一般匠人都要在每块砖上模(刻)印产地和责任人信息的文字,谁能想600多年后,这些印刻竟成了一种连接——将这座淹没在荒草里的砖窑,和宏伟的南京明城墙紧紧联系在一起。相同的铭文,也见于南京明城墙的城砖上。

和我们一样“不识货”的人其实很多。我们的到来,让老陈格外开心——在我们来之前,他已经默默陪着这座砖窑走过一段漫长岁月。

窑口不像城墙有名,之前尚未得到应有保护。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就这样“沉寂”在了村子里。散落的碎砖,就是荒草里发出的微弱声音。如果不是文物普查,可能再过些年,这座砖窑就会彻底湮灭在历史里。还好,在它彻底消失之前,我们听见了“荒草里的声音”,围观的群众也听见了。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要守护好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文物遗迹,让更多人看见这些淹没在荒草中的历史文化。

(作者为湖南省株洲博物馆助理馆员)



▲湖南株洲醴陵窑下湾窑址的城砖。潘晨嫣供图

▲河南滎池曹端祠。马建刚摄



▲河南省滎池县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